

# 社会分层、分配公平理念与收入分配感知

——基于合法化的分析框架

□ 王 鹏

**内容提要** 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态度相关研究愈发受到学者关注。收入分配态度的形成既涉及社会心理过程，也是社会分层秩序在观念领域制度化的结果，而合法化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机制。本文构建起以合法化机制为核心的解释框架，探究社会分层如何通过形塑民众的分配公平理念，进而对收入差距感知产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民众的分配公平理念和收入差距感知都存在明显的职业群体差异。合法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分配态度的职业群体差异，其中，价值规范的合法化是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的重要来源，而地位认知的合法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收入分配态度的合法化解释框架作为沟通宏观结构与微观态度的分析工具，为我们研究社会分层的主观后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社会分层 合法化 态度 分配公平理念 收入差距感知

作者王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北京 100871）

DOI:10.14167/j.zjss.2026.03.009

## 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议题。过去几十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整体性收入差距的显著上升，（Piketty & Zucman, 2014; Xie & Zhou, 2014）这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收入分配相关社会态度的广泛讨论。（例如 McCall et al., 2017; Clark & D'Ambrosio, 2015; Wang & Olivos, 2024）既有讨论指向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公众对于社会收入差距并不存在普遍性的共识。（Osberg & Smeeding, 2006; Chambers et al., 2014）尽管某一社会的客观收入分配状况是确定的，但不同群体对于分配状况的态度却存在很大差异。换句话说，尽管收入分配相关的态度是社会分层状况的主观反映，但社会分层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收入分配态度的群体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制度变迁过程。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问题依然存在，且在不同地区、行业和群体之间呈现出复杂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2022年降至0.467，<sup>①</sup>但这一数据仍处于相对

<sup>①</sup>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较高的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推动分配公平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实现分配公平也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剧烈的转型过程以及分配状况的变动，必然会引发民众对于分配公平相关的态度和观念的变化。尽管收入差距拉大可能会加剧社会不稳定，但大多数社会调查和研究显示，中国民众对于收入差距具有较高的容忍度。（Wu，2009；怀默霆，2009；谢宇，2010）相较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甚至对收入差距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也对分配制度持更加乐观的态度。（Whyte，2010；Whyte & Im，2014）如何解释中国不平等态度的群体差异，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过往学者或是从宏观社会结构角度出发，分析了经济发展、地区和单位差异以及收入差距状况对收入分配相关态度的影响，（怀默霆，2009；魏钦恭，2020）或是从个体的心理维度出发，考察了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等心理机制对个体公平感的作用。（马磊、刘欣，2010；孟天广，2012）

然而，从宏观的分层结构到微观的个体态度，社会分层秩序如何转化为个体收入分配态度的差异，却缺乏系统的解释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化机制尤其是合法化理论，为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化与态度变迁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刘欣、胡安宁，2016）与此同时，中国转型社会的独特经验，也为检验和丰富合法化理论对收入分配态度的影响提供了特有的研究空间。本文试图以相关理论探讨为基础，构建起以合法化机制为核心的解释框架，连接宏观分层秩序与微观个体态度，从而探究社会分层如何通过形塑民众的合法化理念，进而对收入分配态度产生影响。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分层秩序如何通过合法化机制影响不同群体对于收入分配的态度，包括规范性态度——分配公平理念，以及评价性态度——收入分配感知。

## 二、文献综述

### （一）社会分层与收入分配态度

民众对于收入分配的态度不单取决于社会收入分配的一般状况，还与一系列群体性特征有着密切联系。正如学者所言，不同群体的人持有彼此不同，但群体内部相对一致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自身利益和政治偏好。（Kelley & Evans，1993）而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社会分层秩序于个体的直接反映，不仅综合了其自身的地位和利益，也与政治偏好息息相关，因此是我们考察收入分配态度群体差异的重要变量。（Rodriguez-Bailon et al.，2017）中国的社会分层如何影响个体关于收入分配的态度，既往研究已经展开了广泛讨论，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路径：宏观结构路径、社会心理路径、新制度主义路径。

宏观结构路径的解释聚焦于结构性的分层变量对个体分配态度的影响。这一系列的研究将关注点放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收入差距状况、单位类型及户籍差异等结构层次的变量上，其核心解释机制是基于自身结构位置的自利原则。（怀默霆，2009；李颖晖，2015；方长春，2017；魏钦恭，2020）社会心理路径则从微观角度出发，关心的是个体在形成某一态度时所受到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机制包括社会接触和社会比较带来的认知偏差及相对剥夺感。（Dawtry et al.，2015；魏钦恭，2020；马磊、刘欣，2010；孟天广，2012；李颖晖，2015；Smith et al.，2012）这两种解释路径分别在宏观与微观层面分析了收入分配态度在群体间的分化，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解释力上的不足。例如，宏观结构路径无法很好地回答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对收入差距却有着较高的容忍度。社会心理路径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更大范围的制度

环境的作用，无法顾及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感受的影响。

与前两种解释路径不同，新制度主义路径试图沟通宏观结构与微观心理机制，阐释环境与个体的互动如何将社会共识转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判断。（刘欣、胡安宁，2016）其重视合法性原则，强调社会成员的行动、利益、偏好嵌入在制度环境当中并受其影响，同时也会通过个体的感知和评估内化为自身的主观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主义路径并非与前两种路径相冲突，而是可以借由合法性机制，统合于一个连接了宏观与微观的分析框架当中。那么，合法化机制如何能够从社会分层的结构性因素出发，解释个体对于收入差距的微观态度的职业群体差异？

## （二）合法化——从结构位置到个体态度

### 1. 合法化理论

合法化是社会制度转化为普遍共识的制度化过程，其核心概念是合法性（legitimacy）。合法性被定义为：在一个社会过程中，某个社会实体所处的大社会框架中的文化叙述被建构出来，用以解释并支持该社会实体的存在。（Berger et al., 1998）正如韦伯所说，只有在当行动是由某种确定的准则或规范指导时，这个秩序才是合法的。（Weber, 1978）合法性代表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承认，大家都认为是这样、应该这样，那么即使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不公平、无效率），（Zelditch & Walker, 1984）个体也认为应该这样做。

合法性赋予资源分配和地位差别以合理性，使得现存的社会秩序被内化为个体的行为规范。但在解释群体间态度时，简单的合法化理论存在明显的解释空间的不足。例如其无法解释：人们接受合法化理念的动机是什么？这种合法化理念在不同群体间是否也有不同的作用？系统合理化理论和社会优势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为丰富和详细的阐释。

### 2. 合法化作用机制：系统合理化与社会优势

系统合理化，指的是使现有社会安排合法化的心理过程，即使现有的制度安排不符合个人或团体的利益。（Jost & Banaji, 1994）系统合理化理论试图解释：为何一些可能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态度与信念会被广为接受？该理论认为个人通常会为现有制度辩护，并接受现状，以实现其各种动机。（参见 Jost & Hunyady, 2005；Jost et al., 2008）首先，个人接受现有的体系以追求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现行制度可以赋予人安全感。其次，普遍的制度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形成，即社会制度为个人提供了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或结构。因此，当制度合理化并满足这些动机时，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性在特定情况下趋于减少。（Jost & Hunyady, 2003；Jost et al., 2008）

社会优势理论的观点则集中在如何通过“合法化神话”建立意识形态霸权，为在社会系统内分配社会价值的社会实践提供道义和理智上的依据。（Sidanius & Pratto, 2001, pp. 31-58）社会优势理论认为基于群体的压制是由系统的制度和个人偏见所驱动，人们会分享使偏见合法化的知识和信念，并且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也与这些意识形态相一致。（Pratto et al., 1994；Sidanius et al., 2004）

比较两个理论可以发现，社会优势理论本质上用自利动机解释个体对现有制度的接受性，即优势群体在制度安排中享受了对于弱势群体的支配而带来的利益，因此更加乐于维护现有的制度结构。（Sidanius et al., 2004）但系统合理化理论则认为自利并非唯一动机，个体或群体可能在损失利益的情况下仍然接受现有制度，甚至弱势群体的接受程度更高。这也是制度合理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即“当个人和团体的需求与利益的重要性或力量不足时，弱势群体的成员将比强势群体的成员更为支持现有的社会制度及其权威”。（Jost et al., 2004, p. 909）

总而言之，以合法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过程是连接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变化与态度改变的重要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搭建宏观与微观的桥梁，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与收入分配态度的关联。不过，合法化如何影响不同维度的收入分配态度，以及如何作用于社会分层秩序与收入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更加系统和细致的分析。

###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一）收入分配态度的两个维度

过往研究在讨论中国民众关于收入分配的态度时，对态度本身往往没有做明确的区分。态度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津巴多、利佩，2007，pp. 27-33）即态度一般包括了认知、情感性评价和行为倾向性三个方面。（李路路、王鹏，2018）当我们考察与收入分配相关的社会态度时，这三个方面可以指向三个更加具体的问题：收入分配应该是怎样的？现在的收入差距状况怎么样？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了民众对于收入分配本身的规范性认知、对于当前收入差距状况的情感性评价、对于如何应对收入差距的行为意愿。对于本文而言，民众的行为倾向并非考察的重点，因此我们实际关注的是收入分配态度的前两个面向，即规范性（normative）理念和感知性（perceived）评价。

更具体来说，本文关注的收入分配态度包括分配公平理念和收入分配感知。其中，分配公平理念关注民众对于“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的看法。与分配公平感不同，分配公平理念并非关注实然性的判断，而是关注应然性的偏向，是一种社会共享的规范化观念。（Shepelak & Alwin, 1986）分配公平理念可视为个体对收入分配状况的超然评判——当观察某个社会的两种收入分配状况时，人们认为哪种更为合理？而收入分配感知则是民众对于社会实际分配状况的评估，关注实然而非应然。即个体不仅关心自己获得多少收入，还在意自己与他人收入状况的比较，因此这种感知也被称为一种“比较性评估”。（Clark & D' Ambrosio, 2015）

然而，这两种收入分配态度的维度并非截然分开。一方面，人们对现实收入分配状况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的影响。假如一个人认为这个社会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应该是平等的，那么他/她可能会觉得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欠缺平等。（Rodriguez-Bailon et al., 2017）反之，当一个人无法忍受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与他们认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之间的差异时，其会逐步调整自己的规范性理念以适应其感知。（Kelley & Zagorski, 2004）因此，收入分配态度的两个维度可能会相互影响。

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收入分配的规范化理念也发生了显著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分配原则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过渡到改革开放后的绩效主义的转变。（孙明，2009）“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使得收入差距本身在一段时间被视作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怀默霆，2009；谢宇，2010）其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共同富裕开始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凸显出推动分配领域公平性的政策意涵。

分配公平理念是民众关于收入分配的规范化理念，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社会价值领域的回应。需要注意的是，分配公平包括多种层面的含义，本文关注的是民众如何认识分配

结果的公平。如个体倾向于反对收入差距过大，认可“差距小”或“均等性”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属于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公平理念。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民众“患不均”与“患不公”的态度并存，(李路路等，2012)考察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将分配差距与公平相联系，有利于我们把握民众对于“何种分配结果才是公平”的一般性观念以及对于分配结果公平性的追求。

另一方面，对收入分配的主观感知，不仅是客观分配状况在个体层面的映射，也可能包含了个体基于自身价值理念与利益诉求所做的综合判断。因此，以分配公平理念为代表的规范化理念，和以收入差距感知为代表的感知性评价，构成了收入分配态度的两个主要维度。

## (二) 社会分层、合法化与收入分配态度

前文提到，现有研究在分析中国民众对收入分配的相关态度时，多是从宏观结构或是个体微观心理路径出发，而对于二者如何连接则缺乏讨论。刘欣与胡安宁(2016)通过新制度主义路径分析了中国民众收入公平感的职业群体差异的形成机制，尤其强调了自我感知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的差异对于收入公平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宏观与微观的分割。不过，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检验。首先，当我们从收入公平感往前倒推一步，关注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态度本身时，合法化机制是否仍有其解释力？其次，合法化机制不仅包含个体对于社会评价与自身地位的评估，同时也包含了不同群体对于社会价值规范的接受程度。前者基于客观分层地位的主观认知，可以称之为“地位认知的合法化”；后者则是社会价值规范沿着分层结构的差异化渗透，可以称为“价值规范的合法化”。更进一步说，“地位认知的合法化”代表了社会分层秩序被个体接受的情况，而“价值规范的合法化”则反映了关于收入分配的价值理念内化为个体规范化认知的程度。这两种合法化过程对于收入分配相关的态度，尤其是上文所说的规范性理念和感知性评价两个面向的态度，其作用的方式和结果是否相同？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我们结合已有理论提出一个以合法化机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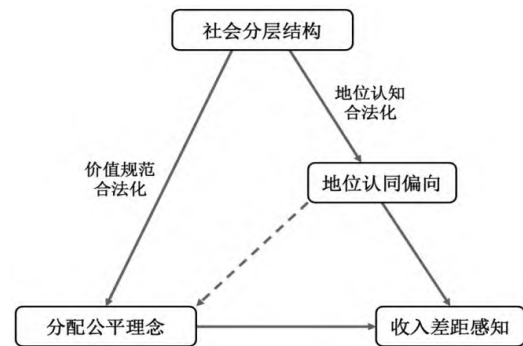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分层与收入分配态度的分析框架

个体处于不同结构位置之中，社会分层秩序对个体收入分配态度的影响主要通过合法化机制实现。首先，同一职业群体因其拥有相似的资源占有状况、文化制度环境以及社会交往网络，会形成相似的价值规范，并通过合法化过程内化为个体对收入分配的规范化理念。社会优势理论认为，社会包含着一些促进或削弱群体地位差异的意识形态，而个体在接受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取决于其渴望为自己和所在群体建立社会优势地位的程度。(Sidanius, 1993)换言之，价值规范的合法化是一种优势群体建立社会共识以维护现有分层秩序的需要。因而，从自利动机出发，优势群体往往更加乐于维护现有的分层秩序，认为收入差距是公平和可接受的，或者说更不认同平均主义的分配公平理念。这一逻辑也适用于分析对收入差距的感知性评价的职业群体差异。社会优势理论倾向认为，职业地位更高的群体对当前地位体系有更高的容忍度，因此对收入差距的感知性评价也会趋于正面，即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并不严重。(Hadler, 2005)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1a：相对来说，职业地位更高的群体，其平均主义的分配公平理念更低，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也更低(社会优势假设)。

然而，正如文献回顾部分所言，自利可能并非合法化的唯一动机。系统合理化理论认为，社

会制度提供了使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或结构,从而可以减少个体的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性。而由于较低地位群体的资源占有能力更弱,他们可能会采取主动的行为来合法化、稳定和支持相关的社会分层秩序,这种支持甚至会比优势群体更加积极和强烈。(Jost et al., 2003; Ledgerwood et al., 2011)例如,人们可能会将自身收入较低归因于教育程度和能力不足,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从而合理化自身的地位现状,减轻内疚和不适。因此,职业地位较低的群体会合理化收入分配的现状,同时降低对其负面的感知。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我们可以假设。

假设1b:相对来说,职业地位更低的群体,其平均主义的分配公平理念更低,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也更低(系统合理化假设)。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收入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价值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在理念之后,会对民众的感知性评价产生影响。当个体对于收入差距的合理化程度越低,即平均主义的分配公平理念越高时,其对于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感知性评价可能会偏向负面,更加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也就是说,个体对于收入差距的支持态度会使他们认为现有的收入分配是正当的,从而降低他们感知到的收入差距程度。(Rodriguez-Bailon et al., 2017)因此,结合假设社会分层与两类收入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价值规范的中介效应假设。

假设2:民众的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地位差异。

同时,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同样蕴含着合法化的社会共识。当群际地位等级相对稳定、群际边界相对清晰时,客观地位结构更易获得合法性并内化为个体对职业地位的感知。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认同可以视作一种社会成员进行自我分类的合法化过程,通过对社会共识的接受使得自我评价等同于该群体的普遍性评价,(Tajfel, 1978)这一过程即前文所说的地位认知合法化。当自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分层结构所塑造的社会共识,个体可能对收入差距有更深感受。反之,当自我感知等于或高于社会共识,个体对收入差距的感受也更低。而过往研究已经发现,职业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职业地位,因而比其他群体感受到更少的收入差距,职业地位较高者则相反。(刘欣、胡安宁, 2016)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因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与客观职业地位的差异,导致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对于收入差距感知的差异变小了,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被个体的地位认同偏向“遮掩”起来了。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收入差距感知的遮掩效应假设。

假设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不一致,缩小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感知差异。

##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选择的数据为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17)。这期数据抽取部分受访者询问了关于收入分配的评价性与规范性态度两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收入差距感知性评价的问题为“我国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关于规范性的分配公平理念的问题为“为了社会公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差异应该很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了民众对于分配差距与公平性之间关系的规范理解,也就是将缩小物质生活差距视为实现分配公平的需要。<sup>①</sup>两者的答案均为从“非常同

<sup>①</sup>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指标并不能代表分配公平理念的全部意涵,而是分配结果公平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

意”到“非常不同意”的5个程度。为了计算和诠释的方便，本文将两个变量作为连续变量处理，进行编码之后，变量数值越高，则代表收入差距感知越大，或倾向缩小差距的分配公平理念更强。同时，本文将样本范围限制在25—64岁有职业信息的受访者。由于收入分配态度相关测量为抽答题，因此删除缺失值之后，本文的总样本量为2701。

自变量方面，本文最为关注的自变量是受访者的职业群体类型，该变量是宏观分层秩序在群体层面的结构化表现。本文采用了埃里克森等学者（Erikson et al., 1979）提出的EGP阶层图式对受访者的职业群体进行划分。由于EGP阶层图式具有分类属性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定序层级，为了理论检验的需要以及结果呈现的方便，本文参照过往研究，（李路路、朱斌，2015；Chen, 2018；Zhou & Xie, 2019）根据受访者当前职业或最近职业，按照EGP阶层图式将其合并为4个职业群体，分别是：管理-专业技术群体、一般非体力群体、体力劳动者群体、农民。地位认同偏向的测量则参考了刘欣、胡安宁（2016）的做法，将该变量定义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声望的一致性程度。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由对问卷中“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这一问题的回答得到，并将上述五类合并为上、中、下三类。职业声望则采用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得分进行测量，（Treiman, 1977, pp. 235-260）并将其根据样本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比例划分为三类。再根据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声望的比较，得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于、等于和高于职业声望三个反映地位认同偏向的类别。

前文已经提到，过往研究在考察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态度时，主要从宏观结构差异和微观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也对这两方面的相关变量进行控制。中国主要的制度性结构差异体现为单位差异和户籍差异，因此我们在分析时控制了受访者的工作单位及户口类型。同时，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差距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本文也加入了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此外，社会接触和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可能对个体社会态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也加入了社会心理机制方面的变量，包括信息主要获取渠道（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源=1），以及交往异质性（与不同职业群体交往=1）。在前两类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流动状况、受教育年限等。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 （二）分析策略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合法性机制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秩序与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将分两步进行分析。首先，我们将检验职业群体与收入分配态度之间的关联，考察不同职业群体在分配公平理念与收入差距感知方面的差异。为方便起见，将其称为职业群体影响分配态度的基本模式，基础模型如下：

$$Ideal = \beta_0 + \sum \beta_m Class_m + \sum \beta_n Structure_n + \sum \beta_k Psycho_k + BX + \mu \quad (1)$$

$$Percep = \beta_0 + \sum \beta_m Class_m + \sum \beta_n Structure_n + \sum \beta_k Psycho_k + BX + \mu \quad (2)$$

其中， $\beta_m$  是职业群体m的系数，代表了不同职业群体在收入分配态度上的差异； $Structure_n$  和  $Psycho_k$  分别代表结构层面及社会心理层面的控制变量；X为其他控制变量。此外，模型（1）中分配公平理念的的职业群体差异，反映了缩小差距这一分配公平理念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在不同群体中的接受程度，即价值规范合法化的状况。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类别	百分比/均值	标准差
职业群体	管理-专业技术群体	20.2%	
	一般非体力群体	28.8%	
	体力劳动者群体	28.1%	
	农民	22.9%	
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		3.786	0.961
收入差距感知		4.315	0.708
地位认同模式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职业声望	25.7%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于职业声望	39.6%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职业声望	34.7%	
工作单位	体制内	18.7%	
	体制外	81.3%	
户籍性质	城镇户口	45.2%	
	农村户口	54.8%	
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源	是	56.8%	
	否	43.2%	
社会交往异质性	是	61.7%	
	否	38.3%	
年龄		42.387	11.289
性别	男性	53.7%	
	女性	46.3%	
受教育年限		10.306	4.134
婚姻状况	已婚有配偶	87.2%	
	其他婚姻状况	12.8%	
流动状况	本地居民	84.2%	
	非本地居民	15.8%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察价值规范合法化和地位认同合法化这两个路径如何作用于民众的收入差距感知。具体操作方式为在收入差距感知的基础模型中,分别加入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及地位认同偏差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 $\beta_m$ 是否会受到价值规范合法化及地位认同合法化的影响。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我们便可以比较收入差距感知的基础模型和扩展模型中职业群体变量的系数差异,从而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考察分配公平理念是否能够解释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或是地位认同偏差是否抑制了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

$$Percep = \beta_0 + \beta_1 Ideal + \sum \beta_m Class_m + \sum \beta_n Structure_n + \sum \beta_k Psycho_k + BX + \mu \quad (3)$$

$$Percep = \beta_0 + \beta_1 Identity + \sum \beta_m Class_m + \sum \beta_n Structure_n + \sum \beta_k Psycho_k + BX + \mu \quad (4)$$

## 五、分析结果

### (一) 职业群体与收入分配态度

我们首先关注不同职业群体在收入分配态度上的差异,表2报告了两个基础模型的结果,我们重点关注职业群体变量的系数情况。在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方面,可以看到其他职业群体的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显著高于管理-专业技术群体。其中,体力劳动者的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最高,一般非体力群体和农民次之。收入差距感知方面呈现类似的职业群体差异,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感知最强,其次是农民和一般非体力群体。基础模型的结果基本支持了社会优势假设,即更高职业地位的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倾向也更高,即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更低,同

时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也更低。不过，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并非随着职业地位的降低呈现线性变化，即农民的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并非最高，而是整体上略微呈现倒U型。这也与过往一些研究的结果相符合，(Han, 2009; Whyte, 2010; Wang & Olivos, 2024) 这可能是因为农民群体更易受到系统合理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最主要的职业群体差异反映在管理-专业技术群体和其他职业群体之间；二是民众在分配公平理念上的职业群体差异要大于其在收入差距感知方面的差异。这是否说明合法化更能引起价值规范性态度而非感知评价性态度的改变，对此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

表2 职业群体与收入分配态度

	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	收入差距感知
职业群体类型(以管理-专业技术为参照)		
一般非体力	0.198 <sup>**</sup> (0.056)	0.075 <sup>+</sup> (0.044)
体力劳动者	0.294 <sup>***</sup> (0.061)	0.132 <sup>+</sup> (0.059)
农民	0.179 <sup>+</sup> (0.089)	0.114 <sup>+</sup> (0.065)
控制变量		
体制内工作	0.132 <sup>+</sup> (0.072)	-0.075 <sup>+</sup> (0.029)
城镇户口	0.029(0.075)	-0.037(0.043)
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源	-0.013(0.065)	0.051(0.043)
社会交往异质性	-0.018(0.041)	0.115 <sup>**</sup> (0.035)
年龄	0.006 <sup>+</sup> (0.003)	0.001(0.002)
男性	0.067(0.041)	0.018(0.041)
已婚有配偶	-0.005(0.070)	0.038(0.042)
流动人口	0.035(0.082)	0.011(0.045)
受教育年限	-0.025 <sup>+</sup> (0.009)	0.002(0.006)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	3.374 <sup>***</sup>	3.908 <sup>***</sup>
	(0.232)	(0.131)
R <sup>2</sup>	0.046	0.031
样本量	2701	2701

注:1. <sup>+</sup>P<0.10, <sup>\*</sup>P<0.05, <sup>\*\*</sup>P<0.01, <sup>\*\*\*</sup>P<0.001; 2. 模型已加权。

控制变量方面，体制内工作的群体分配公平理念更高，但收入差距感知更低，户口性质则并无显著影响。是否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源对分配公平理念的影响并不显著，且系数值非常小。社会交往异质性与收入差距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意味着与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交往可能会增加个体对于收入差距的感受。这表明社会接触和群体比较同个体的感知性评价关系更为紧密，但对规范性理念的影响则非常小，因而也突显出从合法化视角对分配态度进行分析的重要意义。

(二) 合法化机制与收入差距感知

那么，除了直接影响分配态度的职业群体差异外，合法化机制又如何影响了不同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或如何改变了职业群体对分配态度的作用形式？接下来，我们按照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分别考虑价值规范合法化及地位认知合法化对于收入差距感知的影响。表3和图2展示了不同模型的分析结果。其中，价值规范合法化模型是在收入差距感知的基础模型中加入了分配公平理念作为控制变量，地位认知合法化模型则是加入了代表地位认知合法性的地位认同偏向变量，综合模型是将二者同时加入基础模型中。

价值规范合法化模型显示，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与收入差距感知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更加接受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的群体，会对社会中的收入差距状况有更加明显的感受。而在控制了个体的分配公平理念之后，其他职业群体与管理-专业技术群体之间的差异大幅缩小，以至各系

数不再显著。这表明个体的分配公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即不同职业群体对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的接受程度不同，使得他们对于收入差距的感知性评价也出现较大差别。假设2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地位认知合法化模型显示，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职业声望的群体相比，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于或高于职业声望都会有更低的收入差距感知。这与过往类似研究的结论相符。(刘欣、胡安宁，2016) 这表明当个体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低于社会成员的一般共识时，其对于收入差距的感知会更强。需要注意的是，在控制地位认同偏向之后，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感知的差异明显增大了。例如，与基础模型相比，一般非体力群体与管理-专业技术群体的差异系数由0.075增加到0.128，其他两个职业群体的差异系数也出现显著增长。这意味着地位认同偏向起到了抑制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作用。而由于较低职业地位群体更倾向于高估其社会经济地位，进而降低其对收入差距的感知，较高职业地位群体则反之，因此控制地位认同偏向后，不同职业群体的差异反而更大了。假设3同样得到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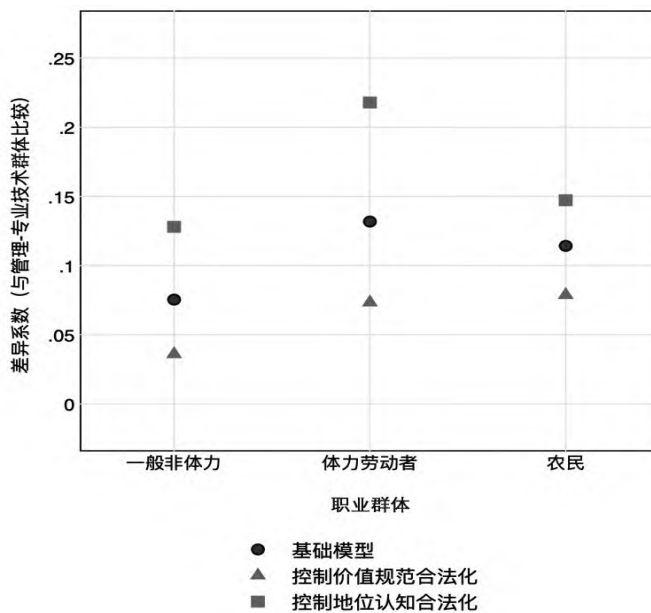


图2 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合法化机制的作用

表3 合法化机制与收入差距感知

	(1)基础模型	(2)价值规范合法化模型	(3)地位认知合法化模型	(4)综合模型
职业群体(以管理-专业技术为参照)				
一般非体力	0.075 <sup>*</sup> (0.044)	0.036(0.047)	0.128 <sup>*</sup> (0.047)	0.085 <sup>*</sup> (0.049)
体力劳动者	0.132 <sup>*</sup> (0.059)	0.073(0.058)	0.218 <sup>***</sup> (0.057)	0.154 <sup>*</sup> (0.056)
农民	0.114 <sup>*</sup> (0.065)	0.079(0.066)	0.147 <sup>*</sup> (0.063)	0.109 <sup>*</sup> (0.063)
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		0.199 <sup>***</sup> (0.020)		0.197 <sup>***</sup> (0.019)
地位认同偏向(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职业声望为参照)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于职业声望			-0.180 <sup>***</sup> (0.045)	-0.174 <sup>***</sup> (0.046)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职业声望			-0.217 <sup>***</sup> (0.050)	-0.204 <sup>***</sup> (0.0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	3.908 <sup>***</sup> (0.131)	3.237 <sup>***</sup> (0.127)	3.983 <sup>***</sup> (0.128)	3.316 <sup>***</sup> (0.127)
R <sup>2</sup>	0.031	0.100	0.043	0.111
样本量	2701	2701	2701	2701

注:1. <sup>\*</sup>P<0.10, <sup>\*</sup>P<0.05, <sup>\*\*</sup>P<0.01, <sup>\*\*\*</sup>P<0.001; 2. 模型已加权。

综合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当两种合法化机制同时得到控制，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几乎与基础模型没有差别。也就是说，价值规范合法化对于收入差距感知的扩大效应，以及地位认知合法化的缩小效应，共同形塑了当前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状况。

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两种合法化机制在影响社会分层与收入差距感知关系上的作用，在上述

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对于两种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Sobel 检验表明分配公平理念的中介效应及地位认同偏向的遮掩效应均显著。图3直观展示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以管理-专业技术群体为参照，在价值规范合法化方面，分配公平理念能够解释一般非体力群体与参照群体53.1%的差异，解释体力劳动者与其45.3%的差异，以及农民群体与其31.8%的差异。在地位认知合法化方面，以控制地位认同偏向后的差异系数为总体，三个不同职业群体与参照群体的差异在控制地位认同偏向后分别增加了35.9%、34.3%、16.2%。换言之，正是由于地位认同偏向的存在，使得我们所观测到的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更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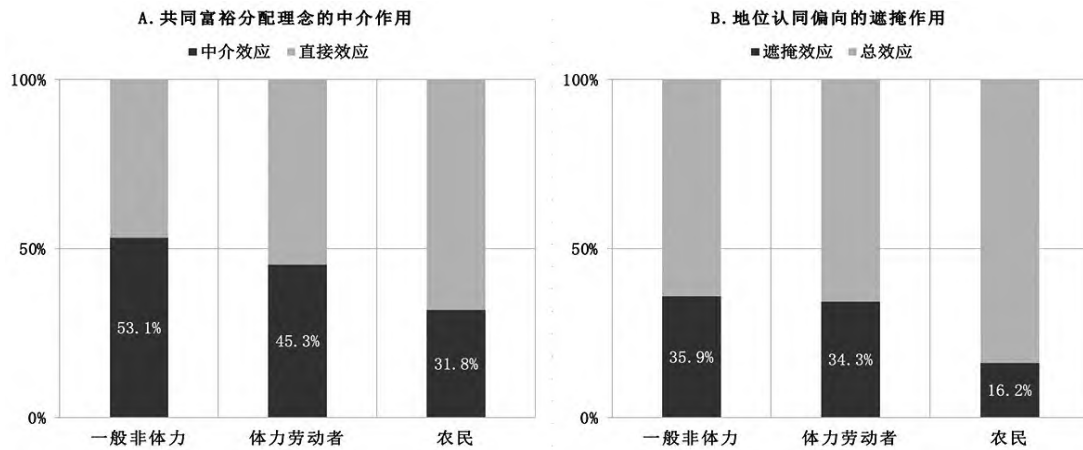


图3 合法化机制对收入差距感知的中介作用和遮掩作用(以管理-专业技术群体为参照)

### (三) 补充分析：地位认同偏向、收入差距感知与分配公平理念

在图1的分析框架中，虚线代表了地位认同偏向对于分配公平理念的可能影响。那么，个体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关于收入分配的价值理念？为了检验这一路径是否成立，我们增加了一个补充分析，在分配公平理念的基础模型中加入地位认同变量，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地位认同偏向对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的影响非常小且并不显著，而且并未显著改变职业群体与分配公平理念之间的关系。因此图1中的虚线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与收入差距感知的影响因素形成鲜明对比。与之相似，社会心理因素对两类收入分配态度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即社会接触和社会比较会影响个体对于收入差距的感知，但是对分配公平理念的作用却很小。这表明收入分配的规范性态度更多受到个体在实际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作用，而非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或是与周围群体的比较。

此外，评价性感知也有可能反过来对规范性理念产生影响。(Kelley & Zagorski, 2004) 因此是否存在与假设3相反的情况，即收入差距感知也可能解释了分配公平理念的的职业群体差异呢？为检验这一机制是否存在，我们在分配公平理念的基础模型中加入了收入差距感知变量。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感知与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确实呈现正向相关性。然而，在控制收入差距感知后，职业群体的差异系数虽然有所减小，但与基础模型相比变化不大，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依旧显著。除体力劳动者的系数变化较为明显外，其他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则显示收入差距感知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收入差距感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分配公平理念的的职业群体差异，作为态度中更深层次的价值规范，分配公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分层与收入差距感知之间的关系，而非相反。

以上的补充分析进一步说明，在合法化分析框架下，规范性理念与感知性评价具有不同的形

塑机制，突显了将收入分配态度的两个维度进行区分并探究其内在关联的重要意义。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社会分层与收入分配态度的关系出发，构建了一个以合法化为核心的解释框架，试图连接宏观分层秩序与微观个体态度，从而理解不同维度收入分配态度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社会分层结构对收入分配态度的影响受到相对地位优势情况及系统合理化程度的作用，从而呈现一定的职业群体差异。同时，价值规范合法化与地位认知合法化过程则在职业群体与收入差距感知之间发挥了不同形式的中介作用，放大或缩小了不同群体对于收入差距感知的差异。

首先是社会分层与收入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民众在收入分配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职业群体差异。其中，在分配公平理念方面，职业群体与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整体呈现“倒U型”关系，管理-专业技术群体的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最低，其他职业群体较高，而体力劳动者最高。分配公平理念的差异整体上支持社会优势假设，反映出相对优势群体对于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要比其他职业群体更高。但农民的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却并非最高，即使在控制了结构变量及社会比较等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如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系统合理化假设，即结构地位较低群体对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并非完全从自利角度出发，而是有着自我处境合理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收入差距感知方面，职业群体与收入差距感知整体呈现“厂字型”关系，其中管理-专业技术群体的收入差距感知最低，体力劳动者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感知较高，似乎更加支持社会优势理论。同时，社会心理机制对分配公平理念并无显著影响，社会接触和社会比较虽然会提高民众的收入差距感知，但并不能解释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

其次，不同的合法化过程在对收入分配态度的影响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在价值规范合法化过程中，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在不同职业群体中的合法化程度不同，其进一步影响了民众对于收入差距的感知性评价。也就是说，分配公平理念是社会分层结构影响收入差距感知的重要中介。平均主义分配公平理念越高的个体，其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感知也更加强烈，因而价值规范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另一方面，地位认知合法化过程则是通过民众对于自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判断，进一步影响其对于收入差距的感知性评价。与价值规范合法化不同，地位认知合法化对于收入差距感知的职业群体差异起到遮掩作用。职业地位较低者往往更易高估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降低其对收入差距的感知程度。控制地位认知偏向之后，不同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感知的差异更大了，且呈现与分配公平理念相似的“倒U型”结构，反映出不同类型的分配态度在职业群体差异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地位认同偏向对于分配公平理念则并无显著影响。这表明价值规范作为更深层次的社会态度，更多受到民众实际职业群体位置的影响；而收入差距感知作为民众评价性态度的直接表达，则更易受到深层次价值理念、地位认知差异以及社会比较等心理机制的作用。

总之，合法化作为社会分层秩序在观念领域制度化的实现过程，在解释收入分配相关态度的职业群体差异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除了关注宏观结构或微观心理机制之外，我们同样需要关注宏观分层体系如何内化为不同群体的观念和态度。而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不仅需要在客观层面减少收入差距，缩小社会分层带来的态度差异，也需要在观念和态度层面重视民众分配公平理念的差异，并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提高其主观心理感知，从而为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本文的分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 受限于数据资料, 本文仅对CGSS 2017年的数据进行了截面分析, 并不能以动态视角,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出发考察价值规范的变化是否会引致评价感知的变化。与之相关, 本文的分析无法考虑到所有可能影响职业群体态度差异的因素, 因此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另一方面, 本文从理论层面判断分配公平理念更多影响了个体对于收入差距的感知, 而非相反。由于本文的分析并非因果推断, 因此在得出结论时应保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承认两者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不过, 中介分析的结果提示我们更可能是分配公平理念充当了职业群体与收入差距感知之间的中介, 而非相反, 因而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判断。此外, 分配公平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包含了分配制度公平、分配原则公平、分配方式公平等诸多方面。考虑到本文探究的重点是收入分配的结果, 同时囿于数据中相关测量的不足, 我们在分析时更多强调了与分配结果相关的公平理念。也期待后续研究能够结合新的方法和数据, 更加全面地考察分配公平相关理念与其他收入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

###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邓羽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版。
2. 方长春:《收入不平等的公众感知与态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1期。
3.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 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5. 刘欣、胡安宁:《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社会》2016年第4期。
6.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7. 李路路、朱斌:《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8. 李颖晖:《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社会》2015年第1期。
9. 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社会》2012年第6期。
10. 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11. 孙明:《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2. 魏钦恭:《收入差距、不平等感知与公众容忍度》,《社会》2020年第2期。
13.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14. Berger, J., Ridgeway, C. L., Fisek, M. H. & Norman, R. Z., “The Legitimation and Delegitimation of Power and Prestige Ord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8, 63(3): 379-405.
15. Chambers, R. J., Swan, K. L. & Heesacker, M., “Better off than We Know: Distorted Perceptions of Incom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merica”,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5(2): 613-618.
16. Chen, M., “Does Marrying Well Count More than Career? Personal Achievement, Marriage, and Happiness of Married Women in Urba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8, 50(3): 240-244.
17. Clark, A. E. & D’Ambrosio, C., “Attitudes to Income Inequality: Experimental and Survey Evidence”, i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2015, 2: 1147-1208.
18. Dawtry, J. R., Sutton, M. R. & Sibley, G. C., “Why Wealthier People Think People Are Wealthier, and Why It Matters: From Social Sampling to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6(9): 1389-1400.
19.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 Portocarero, L.,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30(4): 415-441.
20. Hadler, M., Why Do People Accept Different Income Ratios? A Multi-level Comparison of Thirty Countries, *Acta sociologica*, 2005, 48(2): 131-154.
21. Jost, T. J. & Hunyady, O.,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13(1): 111-153.
22. Jost, T. J. & Banaji, R. M.,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4, 33(1): 1-27.
23. Jost, T. J., Banaji, R. M. & Nosek, A. B., “A Decad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 Quo”,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25(6): 881-919.

24. Jost, T. J., Glaser, J., Kruglanski, A. W. & Sulloway, F. J.,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3, 129(3): 339.
25. Jost, T. J. & Hunyady, O.,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14(5): 260-265.
26. Jost, T. J., Ledgerwood, A. & Hardin, D. C., "Shared Reality,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Basis of Ideological Belief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8, 2(1): 171-186.
27. Kelley, J. & Evans, M. D. R., "The Legitimation of Inequality: Occupational Earnings in Nine N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9(1): 75-125.
28. Kelley, J. & Zagorski, K.,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Inequality: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the Free Market in Central-East Europe,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04, 22, 319-364.
29. Ledgerwood, A. N., Mandisodza, A., Jost, T. J. & Pohl, J. M., "Working for the System: Motivated Defense of Meritocratic Beliefs", *Social Cognition*, 2011, 29(3): 322-340.
30. McCall, L., Burk, D., Laperrière, M. & Richeson, J. A., Exposure to Rising Inequality Shapes Americans' Opportunity Beliefs and Policy Suppor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36), 9593-9598.
31. Osberg, L. & Smeeding, T., "'Fair' Inequality? Attitudes toward Pay Differentials: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71(3): 450-473.
32. Piketty, T. & Zucman, G., 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3), 1255-1310.
33. Pratto, F., Sidanius, J., Stallworth, L. M. & Malle, B. F.,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 Personality Variable Predic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4), 741.
34. Rodriguez Babilon, R., Bratanova, B., Willis, B. G., et al., "Social Class and Ideologies of Inequality: How They Uphold Unequal Societ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17, 73(1): 99-116.
35. Shepelak, N. J., & Alwin, D. F.,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1): 30-46.
36. Sidanius, J.,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Conflict and the Dynamics of Oppression: A Social Dominance Perspective, In Iyengar, S. & McGuire, W. (Eds.),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183-219),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7. Sidanius, J. & Pratto, F., *Social Dominance: An Intergroup Theory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Oppr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8. Sidanius, J., Pratto, F., Laar, V. C. & Levin, S.,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Its Agenda and Method",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25(6): 845-880.
39. Smith, J. H., Pettigrew, F. T., Pippin, M. G. & Bialosiewicz, S.,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16(3): 203-232.
40. Tajfel, H. (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Oxford: Academic Press, 1978.
41. Treiman, J. D.,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42. Wang, P. & Olivos, F., "Where Do Opportunity Beliefs Come From? Implic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for Belief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n Chin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24, 89: 100888.
43. 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44. Whyte, M.,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5. Whyte, K. M. & Im, D., "Is the Social Volcano Still Dormant? Trends in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Inequa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4, 48: 62-76.
46. Wu, X.,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2009, 200: 1033-1052.
47. Xie, Y. & Zhou, X.,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4, 111(19): 6928-6933.
48. Zelditch, Jr. M. & Walker, H. A., "Legitimacy and the Stability of Authority",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984, 1: 1-25.
49. Zhou, X. & Xie, Y., "Market Transi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124(6): 1810-1847.

责任编辑 毕然

framework, thereby alleviating the systemic tension between department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demands of holistic governance. Future research on data governance could introduce an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into the “structure-process” analytical paradigm, thereby extending and deepening explanations of the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collabor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can be sustained.

**Key words:** efficiently accomplish one thing; data; data institution

**Creating Public Value: The Organizational Logic of Value-Added Government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An Enterprise Service Center

(64)

Hu Chongming, Xing Runjie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Value-added services have become a new breakthrough and key component in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services. How to construct an organizational model of government services adapted to value-added services has become an urgent theoretical question. Existing research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factors such as processes, power, and technology, failing to fully explain the strategic changes driven by shifts in value positioning in the latest round of reforms. Using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se of an enterprise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from three dimensions: public value, legitimacy and support, and operational capac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a government service organization oriented toward public value creation can achieve a value leap from efficient fulfillment to cyclical accumulation, expand legitimacy from meeting targets to building consensus, and enhance operational capacity from department-oriented to ecosystem-integrated,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value-added service model.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al logic of value-added government service reforms,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theory, and offers a new analytical path for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government service models and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s. However, issues such as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pathways to achieving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value distribution still require in-depth exploration.

**Key words:** government services; value-added services; public value creati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c chang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dea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ercep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Legitimization Frameworks**

(77)

Wang P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Research on attitudes toward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ese attitudes involves not only social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but also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with legitimization acting as a crucial mechan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cused on legitimization, aiming to connect macro-level stratification orders with micro-level individual attitudes. It investigates how social classes shape the idea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influence perceptions of income inequality.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class differences in both preferences for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erceptions of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 The processes of legitimization largely account for these class differences, with the legitimization of value norms serving as a key factor in shaping perceptions of income disparity, while the legitimization of status identification somewhat mitigates these differences. The framewor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ttitudes legitimizing serves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at links macro structures with micro attitudes, offering a valua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the subjectiv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legitimization; attitudes; idea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perceptions of income disparity